

从生意到生活：跨国青年移民社会融入的多重空间实践探究^①

——基于义乌田野的考察

陆杰华¹ 陈炫齐² 范新光²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 北京, 100872;

2.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 义乌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跨国移民聚居地, 其移民社会融入过程兼具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本文以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视角, 基于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及政策文本梳理, 对义乌跨国移民的空间实践展开田野研究。研究发现, 移民的社会融入呈现出多维度与动态性: 他们形成“聚居—混居”并存的街区格局, 通过商业网络与关系链条持续塑造居住、社区与家庭空间, 但仍面临制度与资源等结构性约束, 政策供给与服务体系尚需回应移民在政策便利、教育公平和文化融入方面的客观需求。本文补充了中国新兴移民城市的经验研究, 也对空间视角下的社会融入理论作出了实证延展, 并为地方政府优化跨国移民治理、推动多元共生的城市空间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跨国移民; 社会融入; 空间生产; 空间同化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25)05-0067-14

1 研究缘起

全球化作为 21 世纪的主要社会经济趋势, 对世界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1-2]。据 2024 年世界移民报告, 2020 年全球约有 2.81 亿国际移民, 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6%, 标志着跨国人口流动的规模性增长^[3]。如今, 移民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4], 并集中在更为有限的目的地国家^[5], 形成了更为密集的全球移民网络^[6]。

移民研究中, 居住与社会融入问题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移民居住模式能够反映社会结构的深层联系, 包括种族、人口、文化、宗教和阶级等社会要素^[7]。移民的社会融入模式包括文化同化、结构同化等, 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具有各异的适用性^[8]。中国语境下, 既往研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环境等方面分析外籍群体的迁入与社会适应^[9-10], 并对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聚居区和跨国商贸网络展开实证考察^[11-12]。

[收稿日期] 2025-09-01

①[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22JJD840001)。

[作者简介] 陆杰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老龄健康研究; 陈炫齐(通讯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 范新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人口分析方法研究。

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以利好政策与贸易环境吸引了大量来自阿拉伯、非洲、中亚及东欧的移民,逐渐呈现“聚居与混居”交织的空间格局^[13]。义乌既非典型的超大城市,也不同于边境口岸城市,对理解中国新兴移民目的地的社会融入具有独特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对“社会融入—空间实践”之间的动态互动缺乏细致讨论。空间同化理论^[14]和空间生产理论^[15]为理解移民的社会融入和空间生产提供了理论支持与视角。如何将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相结合,解释移民在居住、社区、商业及家庭等场域中如何建构社会生活空间,仍有待深入探索。

基于此,本文选取义乌作为田野点,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就移民的社会融入与空间实践提出以下核心问题:第一,在义乌这一特殊的国际商贸环境中,跨国移民如何展开经济、生活与文化活动并进行社会融入?第二,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移民如何塑造聚居与混居并存的街区空间?第三,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的实践如何作用于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体现社会融入结果?通过讨论上述问题,本文旨在从空间视角理解跨国移民的社会融入,补充中国新兴移民城市的经验研究,并为地方政府优化移民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2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2.1 理论基础

自齐美尔开始,社会学界出现了对于“空间”的系统论述,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得到概念化^[16]。作为继承者,芝加哥学派主要将城市空间视为一种消极的物理空间,其“社会性”并未得到强调。20世纪下半叶,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等学者使“空间”问题逐步成为学界的核心关切,也使主流社会学研究发生了“空间转向”。

在移民社会融入研究中,移民在迁入地的居住方式与空间受到了学者关注。空间同化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

2.1.1 空间同化理论

“空间同化”理论^[14]从居住空间的角度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入,指出空间融合是社会融入过程中关键性的步骤,在物理上还未融入社会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同化和融合很难实现。

空间同化理论认为,移民在迁入国的社会群体中通过获取资源实现同化,而这一过程与他们的居住方式和迁居行为密切相关。有研究从空间同化视角出发,发现外籍人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网络和文化适应等对居住迁移和迁居频率均有显著影响^[17]。

2.1.2 空间生产理论

不同于空间同化理论对个体的关注,列斐伏尔^[15]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主体,侧重宏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主张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非物质运动的静止容器,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该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空间与社会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当前,“空间生产”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用于解释公民网络在正式空间中的生产^[18],以及梳理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机制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19]。移民研究中,有研究基于外籍商人在义乌市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讨论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其聚居和分散居住的共同作用^[13];也有研究探讨义乌移民在私人空间、社区空间和社交空间中的社会融入过程,指出家庭、社区和人

际交往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介入、社会交往圈拓展、文化交流和认同的影响^[20]。

与社会融入研究传统的经济视角和文化视角相比，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环境视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认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融合态度、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等对少数民族群的开放度和接受度都是影响居住模式的重要因素^[15]。

2.2 移民研究文献回顾

2.2.1 社会融入作为研究路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早期研究以不同模型来阐释社会融入过程，如“社会生态适应”理论强调流动人口适应的双向性^[21]；有研究提出，社会融入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22]；也有研究通过多层次广义线性模型探讨制度排斥和社会歧视的影响^[23]。

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核心概念，涉及个体自我认知、社会角色接受及群体认同^[24]。此外，制度性障碍，特别是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融入有重大影响^[25]。而女性婚姻移民面临“双重外来者”身份，其社会融入过程尤为复杂^[26]。

国际移民研究进一步结合种族多样性，探讨了移民政策的排他性与包容性^[27]，强调社会结构对融入过程的影响^[28]。理论层面上，“分割性同化”理论揭示了移民第二代的社会融入特点^[1]，对移民居住模式的分类^[29]拓展了对当代移民社会融入复杂性的理解。

移民的社会融入受到社会资本、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包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移民社会融入的深入比较与长期影响的跟踪研究，未来应关注移民个体的主观体验与融入过程。

2.2.2 在华跨国移民研究

中国作为新兴移民目的国，吸引了大量国际移民，尤其在广州市、上海市和义乌市等经济活跃地区。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适应等角度展开，探讨了移民的迁入、商贸、社交、婚姻及相关政策等。

宏观层面上，既往研究强调国家治理，提出构建国际移民治理框架以应对移民治理挑战^[12]。城市层面的研究分析了国际移民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发现移民促进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和宗教文化景观的形成^[10]，且移民的空间聚集对社会距离也具有影响^[30]。群体层面的研究，探讨了义乌阿拉伯人和广州外籍穆斯林的社会网络与文化适应，揭示了特定移民群体在融入中的挑战与机遇^{[11][31]}。

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中，教育和语言能力对移民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32]，而移民网络则是融入过程中的关键社会资本^[33]。政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公平性，对移民融入机会与社会地位也有直接影响^[34]。

2.3 文献述评

综上，既往研究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体而言，空间视角的引入拓展了移民社会融入研究对居住模式、社区关系与城市结构的整体考察^[14-15]。国内学者则揭示了在华跨国移民的商贸网络、宗教生活及政策治理经验^{[11-12][31]}，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移民融入提供了参照。

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或传统侨区，对义乌等新兴“二线移民城市”的关注与认识相对不足。此外，现有研究多为宏观政策与结构性分析，基于田野细节的微观探讨有限。理论应用方面，

社会融入研究以同化论、文化多元论或社会资本框架为主,较少与空间生产等理论结合,对于中国本土移民社区形成与演化的探讨仍待补充。

基于此,本文拟作以下回应与拓展:一是选取义乌为田野点,补充对新兴商贸型移民目的地的研究;二是将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作为分析主线,考察跨国移民的多层次空间实践;三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方法,揭示移民社会关系、制度环境与空间布局之间的动态互动。

3 研究设计

3.1 田野点与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为田野点,以义乌的跨国移民为研究对象。义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城市,

近年来采取了多项利好国际商贸和移民的政策。目前,国际移民在义乌以街区为单位形成了非洲、阿拉伯、韩国等不同群体的聚集效应。

主要调研地点为义乌市江东街道和福田街道的鸡鸣山、金城、词林和五爱社区,以及义乌国际商贸城。这些地点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聚居点,以商贸街、餐饮街和居民区为主。

3.2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义乌移民街区展开,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3.2.1 访谈法

基于参与式观察所得到的前提认识,为了获取更加多元的访谈对象,本研究于商贸城、咖啡厅和晚间酒吧选取访谈对象并进行半结构式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 编号 | 姓名 | 国籍 | 职业 | 来义时长 | 社区 | 性别 | 年龄 |
|-----|---------|--------|--------|----------|-----|----|----|
| S01 | Ngari | 也门 | 学生/代购 | 1月/内江2年 | 宾王 | 男 | 22 |
| S02 | Mulati | 塔吉克斯坦 | 学生 | 1月/扬州2年 | 福田 | 男 | 21 |
| S03 | Haqq | 阿富汗 | 学生 | 1年 | 江东 | 男 | 21 |
| S04 | Kevin | 毛里塔尼亚 | 学生 | 1年 | 福田 | 男 | 20 |
| S05 | Mayar | 埃及 | 学生 | 19年 | 鸡鸣山 | 女 | 19 |
| S06 | Halim | 阿富汗 | 学生 | 1.5年 | 江东 | 男 | 24 |
| F01 | Abigail | 伊拉克 | 主妇 | 3年 | 鸡鸣山 | 女 | 26 |
| F02 | Afaf | 利比亚 | 主妇 | 1年 | 鸡鸣山 | 女 | 27 |
| F03 | Hagar | 巴勒斯坦 | 主妇 | 1年 | 鸡鸣山 | 女 | 25 |
| C01 | 陈主任 | 中国 | 社区主任 | 当地人 | 金城 | 女 | 42 |
| C02 | 陈书记 | 中国 | 社区书记 | 当地人 | 鸡鸣山 | 女 | 45 |
| C03 | 朱书记 | 中国 | 社区书记 | 当地人 | 词林 | 男 | 43 |
| C04 | 何宣传 | 中国 | 社区公务员 | 当地人 | 鸡鸣山 | 女 | 28 |
| C05 | 王社工 | 中国 | 社会工作者 | 当地人 | 鸡鸣山 | 女 | 27 |
| C06 | 张老师 | 中国 | 汉语教师 | 当地人 | 鸡鸣山 | 女 | 28 |
| C07 | 马依依 | 中国 | 服务员 | 3月 | 南山 | 女 | 24 |
| C08 | 索菲亚 | 中国(回族) | 服务员 | 4年 | 福田 | 女 | 56 |
| B01 | Diana | 巴基斯坦 | 外贸运营 | 1.5年 | 金城 | 女 | 31 |
| B02 | Aban | 阿拉伯 | 商人 | 8年 | 车站 | 男 | 33 |
| B03 | Abbas | 巴勒斯坦 | 商人 | 3年 | 福田 | 男 | 25 |
| B04 | Admad | 叙利亚 | 商人 | 9年 | 五爱 | 男 | 34 |
| B05 | Mouez | 突尼斯 | 商人 | 2月 | 福田 | 男 | 21 |
| B06 | Mary | 毛里求斯 | 商人 | 1周/每年 | 福田 | 女 | 35 |
| B07 | John | 坦桑尼亚 | 商人 | 1周/每年 | 福田 | 男 | 31 |
| B08 | Matin | 沙特阿拉伯 | 商人 | 1周/广州6年 | 福田 | 男 | 32 |
| B09 | Ahmed | 利比亚 | 商人 | 12天/每年 | 福田 | 男 | 29 |
| B10 | Hasan | 埃及 | 商人 | 1月/每年 | 福田 | 男 | 31 |
| B11 | Salman | 印度 | 商人 | 2周 | 宾王 | 男 | 28 |
| B12 | Nuor | 土耳其 | 商人 | 2周/广州10年 | 市场 | 男 | 34 |
| B13 | Ava | 俄罗斯 | 模特 | 2年 | 宾王 | 女 | 22 |
| B14 | James | 坦桑尼亚 | 理发师/代购 | 1月/徐州3年 | 宾王 | 男 | 22 |
| B15 | Kylie | 菲律宾 | 酒吧员工 | 2.5年 | 车站 | 女 | 25 |

访谈,包含商人、服务员、汉语班妇女、留学生、社区工作者等群体,共32名访谈对象(详见表1)。

为遵循研究伦理,本研究取得了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并评估了可能涉及的敏感话题,尽量做到语言与态度的中立性,尊重访谈对象的观点。在报告撰写过程中,本研究对访谈对象的姓名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对敏感信息进行了模糊处理,避免在研究过程中造成伤害。

3.2.2 参与观察法

义乌市的跨国移民主要居住于江东街道、稠城街道和福田街道的鸡鸣山社区、金城社区、词林社区、宾王社区、五爱社区和车站社区。

本研究主要在移民聚居的社区内的咖啡厅、酒吧和国际商贸城、三挺路夜市等公共场合,对国际移民的贸易和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此外,笔者前往鸡鸣山社区的汉语班担任志愿者,对汉语班的儿童和妇女进行深入的观察。

3.2.3 历史文献借鉴法

为了从宏观层面上了解义乌市跨国移民社会融入的制度环境,本研究对义乌相关制度法律、政策等相关资料进行梳理整理,重点对移民居住、商贸和教育的相关规定进行阅读分析,并前往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义乌市城市空间分布和规划。

4 主要研究呈现

基于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分析框架,笔者将对义乌跨国移民的社会融入与空间实践进行呈现,围绕“如何进入空间并融入”“如何借助关系塑造街区”“如何在代际选择中再造或再觅空间”三条线索展开分析。

这些线索对应着移民社会融入的三个关键空间:居住—社区—家庭。在这三类空间中,移民既受到签证制度、市场环境和文化规范等结构性约束,又展现出通过商业网络、宗教实践和家庭策略积极生产社会空间的能动性。由此,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交织成为理解移民在义乌社会融入路径与结果的视角。

4.1 落脚与居留:进入移民空间

就社会融入的过程而言,迁移是移民进入迁入地的首要环节。迁移原因、迁移地选择、居住方式等因素,都影响着后续的融入过程与结果,体现着空间融合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关键性^[13]。而移民物理空间的同化和融入,也是文化和社交等方面同化和融合的前提条件。

4.1.1 落脚路径与动机

此前,上海、深圳和广州等较为发达的城市是移民的主要落脚之处。但如桑德斯^[34]所述,这些城市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几近饱和的商业机会而逐渐流失移民。同时,早期移民城市的经济行为较为随意,且经济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文化适应问题^[10]。

由于政策和移民历史的影响,城市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群体集聚或排斥现象。例如,北京和上海以留学生或技术人员为主,而广州则聚集非洲外商,可能影响潜在移民的选择。近年来,广州等城市逐渐转化为移民“候鸟式停留”的暂居之地,而非久居之处。

“广州的商品更新太慢,客人不喜欢了。我听说义乌小商品特别多,所以我来挑一挑新东西,把生意抢回来。”(B12,土耳其商人)与此同时,义乌凭借更有优势的货品价格、更快的更新速度、

更低的生活成本、更高融合度的移民街区,不断吸纳着从发达城市迁出的移民,成为以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的移民群体的主要选择。

“来中国做生意,谁不知道义乌?”(B09,利比亚商人)1982年,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开业以来,义乌政府提供了诸多制度支持。相较于同一时期海外华人遭到的政策歧视和暴力排斥^[35],义乌的移民在政策制度和社会接纳方面受到了诸多便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义乌开始建设国际商贸城,国际贸易额比例、国外客商人数迅速攀升。由此,以宾王商贸区为代表的社区吸引众多外商迁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生态圈,并逐渐向周边社区扩展。

“义乌真的很适合做生意。而且阿拉伯人和阿拉伯餐馆也多,所以我很喜欢。”(B04,叙利亚商人)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汇聚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常驻外商,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②,成为新兴的落脚之城。

4.1.2 居住空间的选择与差异

既往研究认为,移民社区的形成受到移民迁移流动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37],并涉及特定的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的互动过程^[38]。由于移民社区通常与地缘、亲缘、业缘等关系网络密切相关^[39],社区的地理位置与空间范围也与移民整体社会行动相关。

首批进入义乌的移民偏爱高楼,小商品市场旁的新式高楼因而成为最早的外商聚集地,其中稠城街道和鸡鸣山社区广场最为典型。一批批移民围绕着商贸市场选取了交通便利、房租合适、熟人居住的社区,市场周边中外混居的社会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形成。

“我就住在商贸城附近。做生意离市场近,就先人一步。”(B03,巴勒斯坦商人)与来到义乌的动因相似,市场成为了牵动移民居住空间和社交空间的轴心。绝大多数外籍商人居住于商贸城周边的社区,逐渐形成了商住结合的外国街区,例如鸡鸣山社区的阿拉伯风情街和福田社区的非洲街区等。

以成立于鸡鸣山社区为例,靠近国际会展中心的地理位置为社区带来了便利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条件。同时,大量外国商人的生活需求,催生了面向外国人的社区服务和管理需求,包括语言培训、生活服务、文化融入等。渐渐地,鸡鸣山社区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商、留学生和服务员等移民群体,形成多元化的社区环境。

“有些人经济条件很好,不习惯住在老社区。我们金城确实房租贵,但住起来比较舒服,有空间给他们开公司,而且离市场近。”(C01,金城社区主任)与鸡鸣山不同,金城社区成为了国际移民中相对富有、知识水平高的群体的选择,目前有来自中东国家为主的三百余名移民。外籍居民在中国购买房产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且通常无法获得足够的贷款支持,因此他们大多选择租房而非购房——以金城为代表的高端社区正是以优质的出租屋吸引了这一群体。

整体上,跨国移民以“市场”为轴向外扩展,形成了以鸡鸣山社区为代表的中外混居、商住两用的“跨国流动商贩”社区和以金城社区为代表的各国“大杂居、小聚居”社区^[40]两类社区空间,这印证了空间同化理论中,从物理进入到资源获取,再到社会融入的逻辑。

4.1.3 空间博弈与空间同化

②数据来源:词林社区资料库。

对于义乌跨国移民而言，营商和营生的空间博弈是最大的烦恼，这首先体现于签证问题。

“签证就是我们的续命药，你要么吃，要么死。”（B14，坦桑尼亚理发师）

“学生签证打工会被遣送回国，这就是打工中介机构存在的原因吧。”（S01，也门留学生）

义乌跨国移民持有的签证一般分为四类：工作签证、商业签证、家庭签证和学生签证。大多数商人持有三个月的短期签证，仅有留学生和富商能够申请到一年的长期签证，家庭签证一般为随家庭迁移的女性和孩子持有。

“我已经有硕士学位了，但我还在义乌上本科。交点学费就可以拿到学生签证，很划算吧？”（B02，沙特阿拉伯商人）

签证申请和续签都并非易事，家庭成员因申请失败而分居两国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义乌工商学院等大学能够发放每年一签的学生签证，有效时长远高于工作签证。因此，这一“门路”过去几年在移民群体中口口相传，改变了当地的大学生源结构。

“只有生意规模够大才能申请到仓库，我们只能借朋友的仓库。而且中国的银行不开我的账户，每个月还需要交3000元的保证金，不然就会受到警告。”（B01，巴基斯坦公司运营）除了作为门槛的签证之外，银行账户、仓库储存、物流运输、日常管理，都暗示着义乌营商环境内部存在的不便利因素。

即便如此，在营商空间和营生空间的博弈之间，许多跨国移民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留下。其中，战乱、经济萧条、宗教环境等因素构成移民离开原住国的主要推力^[43]。“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留下的人总会找到谋生的办法。为了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就得承受这些问题。”（B01，巴基斯坦公司运营）而义乌包容的氛围、安宁的居住环境、友好的当地居民、丰富的商业资源，则成为了移民迁移的主要拉力。

在选择迁入义乌后，移民们所居住和赖以谋生的空间并非一成不变。进入既有空间后，移民们也在不同的空间中继续进行选择，并为了更好的生活和营商条件，尝试主动对空间进行主动的改变。

4.2 社区与社群：融入过程的空间生产

当前，移民空间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空间分布或者社区空间。将之置于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既往研究涉及空间生活史与社会关系^[39]、排华法案下华人社区的抵制与变迁^[36]，移民居住隔离的空间生产过程^[41]等。

在列斐伏尔的论述中，空间生产指空间从“生产载体”向“生产对象”的转变，其基础是城市内部、城市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目标是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42]。义乌的移民经历着与既往研究描述所不同的空间生产历程。他们在经历了前期的空间同化后，正悄然通过宗教、国别、种族或语言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形塑着义乌的街区。

4.2.1 隐形国界的空间生产

在官方媒体报道中，鸡鸣山社区被视为义乌最为典型的移民社区融合成功案例。“社区要服务好居民，帮他们融入社区和义乌。目前居民都相处得很好。”（C02，鸡鸣山社区书记）为了打破居住空间和社交空间的“国界”，鸡鸣山社区成立了中外经营委员会，让移民参与日常管理和决策，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参与感。

“社区不会有意地区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但是他们‘天然地’会形成小范围的聚集，移民

整体上和中国人是分散混居的。”(C03, 词林社区书记)词林社区则设有义乌市首个综合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统一办理公安、法律等多部门事务。而移民内部的矛盾,社区则招聘具有威望的外籍志愿者,利用“关系”的手段解决纠纷。

虽然从义乌的城市规划来看,不存在中外居住隔离或纯粹的国别空间,政府也有意促进空间融合,但移民与中国居民的深度融合未能实现。真正的情况是,不同国家的居民虽空间共处,但存在着某种“隐形的国界”。

在《无序的用处》中,森尼特^[43]认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倾向于一种概念化的自我和纯洁的身份,追求社会关系和社交圈子的纯净性,即“纯净身份”。与之对应的,是纯净的集体成员共同组成的、安全的、排外的“纯净社区”空间。

空间生产的构思在义乌的移民街区得到了体现——

一方面,以穆斯林为主的移民通过商业方式将街区改造为阿拉伯生活街,又运用作息时间、饮食口味等集体习惯和民族语言,构建起“纯净空间”的屏障。另一方面,社区内存在着众多移民“礼拜点”,这种宗教场所正是“纯净空间”的典型表现。虽有外事部门进行严格管控,但为了维护社区和谐、尊重移民信仰,社区往往对礼拜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空间的形成与扩展,也持续地吸纳更大规模的成员加入,并对群体外的中国居民产生一种无形排斥。这种排斥虽不具有暴力性,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以主动选择的方式筛选成员,维护空间的纯净。

“中外居民整体上友好但陌生。移民流动性强,忙着做生意,而且有时差,所以社交频率低。”(C03, 词林社区书记)由于客观上的语言障碍、作息时间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别,中外居民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屏障。“邻居都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中文,很难交流。”(B15, 菲律宾酒保)虽然不乏长居义乌的移民与中国居民结为朋友,但移民群体的特征也使义乌的街区形成了无形的国界。

这种无形的国界直接受到移民构成的影响。“我很少参与社区活动,邻居也基本不认识。我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出去谈生意,对不对?”(B04, 叙利亚商人)外籍商人是义乌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商人的逐利性和外贸的时差导致移民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驱动力,并且和中国居民之间构成了黑白颠倒的作息差异。

与之相伴的,是夜间的移民街区。工作时间的后,义乌街区在夜晚几乎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移民世界。“店里白天有中国客人,晚上全都是老外。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根本不是一个时区。”(C07, 咖啡店服务员)

这种奇特的时空景观每天都在义乌街头上演。尤其是晚间10点至凌晨4点,中国居民入睡的时段里,街区成为了移民们通宵达旦的娱乐空间。以咖啡厅和酒吧为主的夜间娱乐场所,经营时间、商品服务、员工国籍也都逐渐“阿拉伯化”或“非洲化”,似乎被移民进行了反向的空间同化。由此,白昼与黑夜的二分时空以肤色与种族的外在表征、语言和宗教的社群属性得到分隔。

4.2.2 关系建构的移民空间

初入义乌的社区空间时,移民往往依赖中介机构、翻译人员以及同族熟人。他们在尝试融入义乌的过程中,也重建着在地的社会关系。关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之间、移民与中介之间、移民与当地居民、移民与社区为代表的官方机构之间的多重互动^[40]。这种社会关系的重塑逐渐构成了移

民的社交网络，并逐渐重塑着移民的社会空间。

既往研究认为，“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指移民与原居地的亲友同胞间建立于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的联系^[44]。“我不知道怎么租房子，但我姐姐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她会帮我搞定。”（B14，坦桑尼亚理发师）在融入过程中，移民网络能为移民提供各种非正式支持，如信息、经济、情感等。

其中，信息在跨国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最为重要。“我叔叔在义乌的生意做得很好。他说义乌很有商机，所以我就来留学了，打算毕业后在这里做生意。”（S02，阿富汗留学生）迁入前，许多移民得到亲友出国致富的信息，因此决定远赴义乌；迁移过程中，富有经验的亲友能够为移民们提供申请签证、应对检查、寻找住处的各种参考信息；而在融入过程中，熟悉义乌的亲友仍会持续地扮演新移民的主要信息源，支持他们在义乌的生意与生活。

“我还没毕业，但朋友提醒我应该尽早考察市场。我弟弟明年也要来义乌，到时候我会把我考察到的情况告诉他。”（S04，毛里塔尼亚留学生）

同样，移民关系网络的无边际性，也使义乌移民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家乡亲友传播义乌的最新信息，持续吸引跨国移民的到来，从而形成庞大而完整的迁移链，并不断强化这一网络。

在移民网络的笼络下，跨国移民也得以通过群体的力量积极构建自己的社会空间——包括居住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他们对于空间的建构，也对义乌的城市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塑了城市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其中，非洲街区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虽不如官方媒体宣传的阿拉伯商区繁华，但非洲街区另有一派生机。

“那一片都是阿拉伯人的地盘，而这里则是我们的家。这些非洲餐厅非常正宗，是只有我们才会来的地方。”（B14，坦桑尼亚理发师）在福田社区的某个街区里，声称全中国最正宗的坦桑尼亚饭店“乞力马扎罗”已经营业多年，辐射出数家非洲餐厅，吸引了诸多非洲人居住于此。作为街区空间的核心，非洲餐馆里移民传递着商业信息或政策动向，俨然构成了非洲人在义乌的“茶馆”，凭借关系网络的力量组织着新的社会空间。

4.2.3 空间争夺与内外之分

移民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运用关系网络，便难以避免亲疏有别的“圈子”出现。这种圈子不仅涉及国籍、宗教和财力，还表现在性别、语言等诸多方面。Bourdieu^[28]强调关系空间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将社会空间视为行动者在其中所处地理空间的建构。这一意义上，移民通过占据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争夺在空间中的位置，也是空间生产的一种过程。

由于义乌的移民群体以穆斯林和印度教信徒为主，男尊女卑的宗教文化十分浓厚。“有些穆斯林丈夫不允许妻子和陌生人见面，而且大多数女性都不会说汉语。所以，我们获取女性意见，其实得到的是男性的意见。”（C05，社工）因此，义乌的外籍商人以男性为主；移民家庭也大多采取男性经商、女性育儿的传统性别分工。大部分穆斯林家庭严格限制女性外出，甚至禁止女性与异性社交。

调查发现，义乌移民中女性的社会融入程度远远低于男性。为此，鸡鸣山社区在暑期开展了儿童和妇女汉语班，以儿童夏令营的机会让女性移民获得空闲时间，并创造了纯女性的汉语教学空间，

让女性移民得以接触外界。“孩子们在学校接受教育，而我们没有，我们需要更有参与度。”（F03，巴勒斯坦主妇）妇女汉语班中，学生十分珍视这一争夺而来的学习机会和女性空间。

但即便是互助的空间，也有内外之分。“我尝试和她们交朋友，可是她们不理我，觉得我不戴头巾就是忤逆安拉。我在义乌的社交圈子特别小。”（B01，巴基斯坦公司运营）金利卡^[45]在《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中提出“内部限制”和“外部保护”的概念。在同质化的群体内部，“集体权利”一方面以文化或宗教正统的名义要求成员恪守角色，避免内部歧异；另一方面寻求群体在更大社会中的独特存在和认同，避免外部决定。

在移民空间中，资源与空间的分配会引起相关群体的共同抵抗与争夺，从而改变既定的空间分布和形态；但出于对纯洁性和安全性的追求，群体往往对不符合规范的内部成员采取排斥措施，从而向外显示出更加团结和独特的内部空间形态。

义乌的跨国移民不仅在社区空间中被政策与市场塑形，同时也以商贸、宗教和社交等方式持续生成新的空间秩序。这种“被同化—主动生产”的双向动力，成为他们后续家庭布局与教育抉择的社会基础。

4.3 家庭与教育：居留空间的代际抉择

社会融入的传统研究中，移民的居留意愿和选择是评估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46]。将其引入空间同化和空间生产的视角中，移民的代际居留和迁移选择，也是义乌市跨国移民空间同化成功与否、空间生产结果如何的具象表征。

4.3.1 居住形态与家庭类型

从居住类型来看，义乌的跨国移民主要分为独居、合居和全家定居三种类型。在商贸城中采购并转销商品的商人大多独居，与中国居民混住；也有一部分移民选择与共同经商的亲友合租；定居家庭则一般由青年夫妻、两三个孩子组成，少有中年或老年移民。

以迁移类型区分，则有定居型、候鸟型和全球迁移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多为跨国婚姻家庭，或生意规模大、精通汉语、对中国和义乌认同度高的移民家庭。而候鸟型则指在祖国和义乌之间往返的移民群体，每年周期性地在义乌进行采购与转销。全球迁移型则指在各国间不断迁移的移民群体，在义乌居住时长较短，往返频次和时长不稳定。

“我就是义乌出生的！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就来义乌开外贸公司。我从来都不想回埃及，因为女孩在埃及不能单独出门，很麻烦。”（S05，埃及学生）

“下周我们就要回毛里求斯了，一般我们每年来中国两次，把货卖完了就再来一次。长期这样来回，也不是很麻烦。”（B06，毛里求斯商人）

“我拿的商务签证只有20天，所以我只能在义乌住两个星期左右。我每年会在印度、中国，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做生意，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时间不是很长。”（B11，印度商人）

而居住形态、居住时长和家庭所在地的差异，也体现着移民群体内部对于义乌生活空间和营商环境的不同态度。根据以上三位访谈对象的表述，定居的移民家庭在义乌的社会空间中融入度更高；候鸟型移民则由于义乌的贸易优势而表现出对于义乌的黏性；对于全球迁移型移民而言，义乌的营商环境更为关键，而生活空间的融入与适应则无关紧要。

4.3.2 再造空间或再觅空间

移民群体对于迁入地的居留意愿并不意味着对于既定空间的全盘接受，当生活或发展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时，移民们的主体性就将得以体现——他们通过扩大空间范围，调用更为丰富的资源为己所用^[8]。而其背面也意味着空间同化或社会融入的背离，当空间生产的阻力或代价过高时，移民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脱离迁入地，再次开启一次新的迁移。

对于北京、上海等经济水平高、国际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而言，移民的教育问题并不棘手。但义乌的学校教育水平和教育模式，成为许多二代移民离开的原因。“外国人不能办学校，只能去很贵的国际学校或者找家教。孩子们没有接触同学，也没学到真的知识。”（F02，利比亚主妇）在义乌，外籍学生的教育机会十分有限。公办学校名额极少，一般只招收定居义乌的富商子女；而民办学校则费用高昂，普通家庭难以负担。因此，许多定居的移民家庭被迫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学。

在义乌有限的社会空间中，另一种横跨两国的教育模式日益成为商人家庭的优先选择。“我爸妈一直都在义乌，但我直到上大学才来义乌。”（S03，阿富汗留学生）这些商人家庭中，父母长居义乌，子女在祖国接受中小学教育，后续申请义乌的大学，为继承家业做准备。这样的阶段化教育选择也为移民的生活和发展空间拓宽了时空范围，持续地吸引着一批批第二代移民归来。

而长期候鸟式迁移的商人家庭，也依靠后代的教育流动为跨国贸易寻求便利。“我来义乌上大学，一边学中文，一边帮父母采购，他们就不用跑到中国了。”（S02，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部分留学生承担起了为家族商业“代理”的职责，为远在家乡的家人传递义乌最新的商业讯息和货物情况。

在现实的考量与家庭的差异情况下，离开义乌也成为了移民家庭代际发展的不得已之举。“孩子们有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能因为做生意就放弃教育，所以我们可能选择离开。”（F02，利比亚主妇）

义乌跨国移民在家庭与教育领域的选择，不仅折射出他们对稳定居留与发展的期待，也体现出移民在全球流动格局中对未来空间位置的主动规划。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在此交织，形成其社会融入与代际流动的重要支点。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义乌的跨国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以社会融入、空间同化和空间生产为理论脉络，综合文献综述与实地调研结果，对移民社会融入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其独特的社会活动与空间实践展现出了“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交织中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落脚与居留是社会融入的起点。义乌移民通过签证、租赁和市场资源完成物理进入，并在住房选择与法律身份的调适中实现初步的空间同化。这与Massey^[14]的观点相呼应：空间进入是社会融入的前提。

第二，社区与社群是空间生产的核心场域。商贸网络、宗教活动和街区社交实践，使移民在结构约束下不断“生产”适合自身的社会空间。他们一方面受到社区治理和市场规则的规训，另一方面又通过经济与文化行动重塑空间秩序，印证了列斐伏尔^[15]关于“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的论述。

第三，家庭与教育策略呈现代际空间规划。移民在家庭居住与子女教育上的选择，既体现制度性同化，也折射出对全球流动性的主动布局。家庭成为他们在本地扎根或跨域迁移的关键“空间节点”。在关注居留意愿^[16]的同时，本文侧重教育选择对移民空间同化和社会融入的影响，补

充了移民群体内部差异和动态的视角。

第四,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并非线性,而是动态交织。移民社会融入是一个持续协商与再造的过程:在制度约束、市场机遇和文化差异之间,他们不断平衡安全与流动、稳定与上升。空间不仅承载社会关系,更是移民能动性与结构力量互动的结果。

本文的理论框架参考了社会生态适应理论^[21]和社会融入多维度理论^[22],强调文化互动的双向性,并继续关注社区支持和移民网络等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24]。而不同于既往研究,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15]应用于分析义乌特定城市环境下的移民空间实践。此外,笔者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义乌市聚居与混居相结合的独特街区空间的形成,对移民社区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综上,本文深入研究了义乌跨国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及空间同化与空间生产过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方法的局限上:由于研究对象是跨国移民,语言差异可能影响理解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义乌市作为田野点,具有一定的范围局限性,有待补充更广泛的田野信息,更加全面地体现移民的社会融入与空间生产过程。

总体而言,义乌跨国移民的社会融入不是单向度的同化,也不是纯粹的文化隔离,而是一个以空间为中介的协商过程。他们既被嵌入当地制度和市场逻辑,又以商业、宗教、家庭等实践不断生产新的空间秩序,丰富了中国语境下移民社会融入与空间研究的经验与理论视野。

[参 考 文 献]

- [1] Portes A,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 [2] 陆杰华,陈炫齐.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基于CGSS2021的检验[J]. *南方人口*, 2024(3):1-13.
- [3] McAuliffe M, Ouchou L A, eds.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4*[M].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24.
- [4] Czaika M, De Haas H.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H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migrator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4, 48(2): 283-323.
- [5] De Haas H, Castles S, Miller M J, et 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end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effect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9, 45(4): 885-922.
- [6] Tranos E, Gheasi M, Nijkamp P.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global complex network[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5, 42(1): 4-22.
- [7] Buck N. Identify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Social Exclusion[J]. *Urban Studies*, 2001, 38: 2251-2275.
- [8] Berry J W. A psychology of immigr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1, 57(3): 615-631.
- [9] 许涛. 在华非洲裔聚居区的类型、特征及其管理启示——以广州地区为例[J]. *非洲研究*, 2015(2):182-195.
- [10] 吴丽君. 中小城市国际移民对城市生活空间的影响[D]. 福建师范大学, 2021.
- [11] 马强. 市场、移民与宗教的根植: 义乌市伊斯兰教民族志研究[J]. *回族研究*, 2010(3):81-88.
- [12] 李树苗,薛琳,宋雨笑. 新时代在华国际移民的融合、发展与治理[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16-28.
- [13] 施雅. 义乌市外籍商人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20.
- [14] Massey D S, Mullan B P. Processes of Hispanic and black spatial assimil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 89(4): 836-873.

- [15] 列斐伏尔·亨利,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王志弘译, 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M], 上海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3.
- [16] 高新宇, 许佳君. 空间重构与移民社区融入——基于“无土安置”工程的社会学思考 [J]. 社会发展研究, 2017(1):73-93.
- [17] 吴晓琴. 空间同化视角下在华外籍人士迁居行为研究 [D]. 浙江师范大学, 2023.
- [18] Dekel T, Meir A, Alfasi N. Formalizing infrastructures, civic networks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Bedouin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Be'er-Sheva metropolis[J]. Land Use Policy, 2019, 81: 91-99.
- [19] Cheng X, Heath T.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raditional towns and villag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2021, 32(2): 71-90.
- [20] 金敏铭. 跨国迁移人群的社会融入研究 [D]. 华东理工大学, 2023.
- [21] Berry J W. Acculturative stress[A]. In: Lonner W J, Malpass R, eds. Psychology & Culture[C]. 1994.
- [22]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 2009(1):17-29.
- [23]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2(5):141-160.
- [24] 周敏, 林闽钢. 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 [J]. 社会学研究, 2004(3):36-46.
- [25] 任远, 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J]. 人口研究, 2006(3):87-94.
- [26] 谭琳, 苏珊·萧特, 刘惠. “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3(2):75-83.
- [27] De Haas H, Castles S, Miller M J.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M]. 2019.
- [28] Bourdieu P.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5, 24(2): 195-220.
- [29] Bochner S. Sojourners[A]. In: Sam D L, Berry J W,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C]. 2006: 181-197.
- [30] 曾东林, 吴晓刚, 陈伟. 移民的空间聚集与群体社会距离: 来自上海的证据 [J]. 社会, 2021(5):56-79.
- [31] 马继. 城市中的阿拉伯人研究 [D].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 [32] 王双燕.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 对在杭外国人的分析 [D]. 浙江大学, 2022.
- [33] 张梅. 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 从唐人街到移民网络的构建——周敏教授访谈录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21(4):16-28.
- [34] 杨靖旻, 杨雪冬. 新时代中国跨边界人口流动与国际移民治理的逻辑与展望 [J].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1(3):74-83.
- [35] 桑德斯, 道格, 落脚城市: 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 2012.
- [36] 威廉姆斯, 贝恩·廖, 无处落脚: 暴力、排斥和在美异族的形成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22.
- [37] Khan R A. Lessons learned in the field: conduc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Bangladeshi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Lisbon, Brussels and Boston[J].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2023, 23(2): 232-244.
- [38] Lin M, Zhou M.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capital: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05, 1(2): 260-284.
- [39] 项飏,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2000.
- [40] 吴潇. 区隔还是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的空间生产 [D].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41] 黄怡. 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 [M],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6.
- [42] 胡小武, 王聪. 从“生产空间”到“空间生产”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模式研究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5):20-26.

- [43] 森尼特, R., 无序的用处: 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 [M], 戎渐歆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23.
- [44] 傅义强. 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 [J]. 世界民族, 2007(3):45-55.
- [45] 威尔·金利卡, 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 [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9.
- [46] Phinney J, Madden T, Santos L.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as predictors of perceiv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minority & immigrant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28: 937-953.

A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Practices Among Transnational Young Immigrants: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Yiwu

LU Jie-hua¹, CHEN Xuan-qi², FAN Xin-guang²

(1.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Yiwu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ettlement for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ir proces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s marked by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mplexity. Drawing on theories of spatial assimil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practice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Yiwu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olicy text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they create neighborhoods where "enclaves" and "mixed residence" coexist, and they continuously shape residential, community, and family spaces through commercial networks and relational ties. However, they still fac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s and resources, while policy provision and service systems need to better address migrants' needs in policy accessibility, educational equity, and cultural inclusion. This study enrich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emerging immigrant cities in China, extends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social integration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transnational migrant governance and foster a pluralistic, coexistent urban space.

Keywords: Transnational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Production of spaces, Spatial assimilation